

宋人富贵诗论的转变

董灵超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宋代诗词, 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 都表现出对“富贵气”的崇尚。随着宋代风尚和文化氛围的变化, 文人对于“富贵气”的评论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从北宋初晏殊“富贵气象”的闲雅风致, 到北宋后期陈师道“看人富贵”的直面现实, 再到南宋葛立方“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 折射出宋代文化品质由享乐到求实、文人文化心理由享受富贵到怀念富贵的变化。

关键词: 宋人; 富贵诗论; 晏殊; 陈师道; 葛立方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5-0082-04

Shift of the poetry comment about riches presented in the Song Dynasty

DONG Ling-c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poetry and Ci and commen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ong Dynasty advocated riches. The comments on the riches changed subtly along with the times and the culture atmospher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Yan Shu's style of rich and honor, with graceful and restrained state of mind, to Chen Shi-dao's facing the reality, then to Ge Li-fang's reminiscence by write down the rich afterward,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 culture character of Song Dynasty had changed from enjoyment to practicalism, and the scholar's cultural psychology had changed from enjoying the rich to memorizing the rich.

Key words: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poetry comment about riches; Yan Shu; Chen Shi-dao; Ge Li-fang

“富贵气”, 是宋初诗词创作和评论中一道特别的风景。无论是婉约词呈现的富丽雅致, 还是晏殊“富贵气象”所受到的追捧, 都是文人富贵享乐追求在文学上的反映。1995年, 杨海明在《文学遗产》发表《唐宋词中的“富贵气”》, 从文学创作方面对宋代文学的“富贵气”予以精彩阐述。2002年, 王德明在《文学遗产》发表《晏殊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2003年又在《北方论丛》发表《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两篇论文, 或从个体、或从整体对宋人的富贵诗论给予了精辟分析。至今, 二人的论文应该是阐述宋人“富贵气”追求的扛鼎之作。笔者在拜服前贤之余, 不揣浅陋, 就宋人的富贵诗论谈点一己之见, 以求教于方家。笔者认为, 宋代富贵诗论在突出表现宋人崇尚“富

贵气”的同时, 也微妙地发生了变化: 从晏殊“富贵气象”的闲雅风致, 到陈师道“看人富贵”的直面现实, 再到葛立方“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 折射出宋代文化品质由享乐到求实、文人文化心理由享受富贵到怀念富贵的转变。

一、“富贵气象”的闲雅风致

欧阳修《送李留后知郢州诗》云:“富贵常情谁不爱? 羨君潇洒有余清。”^{[1]201-202}对富贵的追求, 原是人情之常。在宋代, 表现尤为突出。“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 所以好富贵者, 不过欲多积金钱, 厚自娱乐, 使子孙无贫乏尔。卿等何不释去兵权, 出守大藩, 择便好田宅市之, 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 多置歌儿舞女, 日夕饮酒相欢, 以终天年。’”^{[2]8}这是宋朝开国帝王宋太祖在释其功臣的兵权时说的话。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在《劝学文》中又明言:“书中自有黄金屋”^[3](涵芬楼影印本 100 卷

收稿日期: 2013-09-28

作者简介: 董灵超(1975—), 女, 河南舞阳人,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说郛》卷七十三下，无页码标示)。晏殊即生活在宋初这样一个帝王大力倡导功臣追求富贵享乐、劝导文人读书以求取富贵的时代环境中。

《青箱杂记》载：“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4]46}

用“景致”表现富贵气象，确实是晏殊的创见和着意追求。欧阳修《归田录》又载：“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1]176}显然，“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同样是以“景致”来写富贵气象，不像“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那般流于堆垛金玉字面。

任何一个时代，人们谈论的主题，都离不开社会风尚和受众人群众的支持。晏殊的这两则评论，足见在帝王的大力倡导之下，文人群众对于富贵谈论的热衷。“人皆以为知言”，一方面反映出晏殊“富贵气象”见解的影响力，一方面也反映出参与富贵谈论者之众。只不过，晏殊的见地因其超拔于众而被记载了下来。晏殊的富贵诗论，之所以得到众人的追捧，正在于他用景致、气象来表达富贵，不同于停留在金玉锦绣字面上的流俗之论。他的识见，包含了文人的风雅情怀和文学的美感特质。直到后世，还甚有影响力。

周必大说：“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元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5]659}表现出对晏殊之论的认同。苕溪渔隐曰：“《云斋广录》载近时人诗一联云：‘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虽用珠、绣，其气象岂不富贵，不害其为佳句也。”^{[1]175-176}也是对晏殊“富贵气象”之论的支持和补足。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晏殊论“富贵气象”，是一种闲适生活状态中的艺术玩味：他是从诗作中摘句来言“富贵气象”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

池塘淡淡风”出自晏殊《寓意》一诗：“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6]20}整首诗的意旨是“写一次偶然的邂逅所引起的别后无穷思念”^{[6]21}，与富贵略无关涉。而“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所自的白居易《宴散》一诗，诚如周必大所论“殊未睹富贵气象”。然晏殊将这些诗句拈出用以论说富贵非但没有受到摘句取义之讥，反倒备受众人的认同与叹服，正在于它应合了当时人们盛谈富贵的风习。《宋史·晏殊传》评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7]10197}无论是其创作，还是富贵诗论，都表现出闲雅雍容的意趣，构成一种基于富贵而又超越物质层面的不俗境界。然内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则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富贵的津津谈论和基于不同层面的感受。

二、“看人富贵”的直面现实

晏殊的“富贵气象”之论，在北宋初期极受追捧，及至到了南宋，也还有其影响余绪。然而，在北宋中晚期，晏殊评价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为“善言富贵者也”即遭到了质疑。陈师道说：“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5]303}黄庭坚则说：“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5]303}

陈师道、黄庭坚针对晏殊之论的反驳，当正基于白居易《宴散》诗“殊未睹富贵气象”^{[5]659}的整体基调和诗作意旨。细究此诗旨趣：在曲终人散、繁华热烈过后，送走了客人的白乐天，为何会有“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之举？是宴会尚不足尽兴，还是暑去秋来的时光轮转撩乱了他的心绪？还是盛宴席散带给他的心理落差使然？举凡饮酒，虽不乏自斟自乐之趣，可此际，宴会客散、又“举残杯”很是值得玩味。无怪乎周必大说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5]659}，查慎行也评道：“亦俗所云无不散之筵席也”（<http://wenda.so.com/q/1361331464069658>）。“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出自白居易的《夜归》一诗：“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珑骝。

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楼角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开（前）蜡烛红。”^[8]这次，白居易是半醉出行，避开了那份他原本应该沉浸于中的热烈。无论是《宴散》，还是《夜归》，白居易都成功营造了堂皇热烈的笙歌宴乐场面，但每次他又从这份热烈中走出来，在一种清闲得有些冷然的环境中审视、观望、摹写这份堂皇的氛围。他原本是宴会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但这种抒情主体的自我疏离，很自然地会让人产生热烈归于众客、清冷归于诗人的联想，也即诗人是游离于繁华热闹、富贵热烈氛围之外的远远的观望者，是看人富贵者。

“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出自杜甫《题省中院壁》。全诗如下：“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霭常阴阴。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袞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仇兆鳌曰：“上四省中之景，下乃自述其怀。……顾注：‘垣覆梧桐，门皆对霭，宜其气象阴森。’……张綖注：‘白日静’，慨素餐也。‘青春深’，惜时运也。二句景中有情，故下接云：‘谬通籍’，‘违寸心’。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遗，时已晚矣，乃迟回一官，未尽言责，徒违素心耳。职无补而身有愧，乃题于院壁以自警。”^[9]黄庭坚认为“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当与黄庭坚对杜甫诗作“无一字无来历”的推崇和诗歌句律用法的考究不无关系，然之所以他会将此二联诗句加以对比，正在于杜甫此诗，亦是发抒抑郁不平之作。二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惜时”和无所作为的人生感慨上构成了交合。

富贵，可指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享有的客观物质状态，也可指一个人在精神层面对优裕物质生活的真正享受。但事实上，并非每一个身处物质优裕境遇中的人，都会在精神上获得与之对等的心满意足之感。陈师道和黄庭坚对“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论断，正基于对白居易身处热烈而心生怅然的幽微情思的认识。无论是陈师道所说的“看人富贵者也”，还是黄庭坚说它“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都是从《宴散》原诗的意旨出发立论。而不是像晏殊那

样摘句来考究其“富贵气象”。这种变化，与北宋中晚期的文化风尚、社会状态以及陈师道、黄庭坚个体的人生感悟与追求密不可分。

从欧阳修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始，基本上奠定了宋诗的品格和特征。“在政治上，欧阳修针对皇室奢靡和官吏冗滥之弊，提出‘务农节用’、‘宽简政治’等务实主张，在文学上，则针对唐末五代以来文坛虚空浮靡之弊，力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与政治主张相适应。”^[10]¹⁷⁵《四库全书总目》有论：“宋初诗文尚沿袭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殆。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11]¹³²⁰

黄庭坚、陈师道是在古文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他们扬弃了晏殊的“富贵气象”之论，而着眼于诗作意旨来评价白居易的《宴散》一诗，从而得出与晏殊不同的结论。

三、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

《清波别志》载：“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12]³⁻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言：“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12]¹⁹⁻²⁰无论是故老闲坐谈京师风物，还是《东京梦华录》追记京师风俗，都表现出兵火沦落后，南渡人物深切的家国之痛和对昔日富庶繁华的无限追怀。那份升平王朝曾经的富贵荣耀，也在宋人的“富贵”诗论中余焰未熄，偶尔会被加以追笔记载。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载：“人言居富贵之

中者,则能道富贵语,亦犹居贫贱者工于说饥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贵,则其诗章虽欲不富贵得乎?故岐公之诗,当时有至宝丹之喻。如‘宝藏发函金作界,仙醪传羽玉为台’,‘梦回金殿风光别,吟到银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晏元献云:‘太乞儿相。若谙富贵者,不尔道也。’元献诗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此自然有富贵气。吾曾伯祖侍郎讳宫,虽起于寒微,而论富贵若固有之。尝有诗云:‘翩翩燕子朱门静,狼藉梨花小院闲。’又云:‘西楼月上帘帘静,后苑花开院院香。’其视晏公真不愧矣。”^{[5]490-491}值得注意的是,王禹玉诗作的“至宝丹”现象,曾是北宋诗论中被批判的对象。《后山诗话》云:“王岐公诗喜用金璧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也。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1]176}很显然,无论是王禹玉之兄,还是陈师道,都不赞成他诗作中“至宝丹”式的“富贵”表达,陈师道明确将这种“富贵”表现归入与“雅”对立的“俗”。《王直方诗话》亦载:“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有人云:‘诗能穷人,且试强作些富贵语看如何。’其人数日搜索,云止得一联曰:‘胫挺化为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为之绝倒。”^{[1]176}在此,“至宝丹”依然是被作为讥嘲对象出现的。然而,到了南宋葛立方笔下,曾被北宋人讥嘲的“至宝丹”现象却被他郑重地作为“富贵”诗作的一类代表加以对待。与此同时,他又通过追记其曾伯祖葛宫的诗作来表达对晏殊“富贵气象”之论的推重与攀附,表现出不同于北宋人的对于富贵诗作和富贵诗论的兼收并蓄态度。其中原因,当不乏葛立方既像北宋人推重晏殊的“富贵气象”之论,同时又对王禹玉“至宝丹”类“富贵”诗作所源自的作者处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极是赞赏留连。他是怀着深厚的情感,将这两种“富贵”抒写,都视为大宋王朝曾有的荣耀而予以记载的。显然,葛立方的“富贵”诗论,无论所举诗作,还是所述理论,都是之前北宋升平时期的产物,也属追记之笔。而如周必大所说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一联,“偶经晏元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5]659}同样也属于对晏殊“富贵气象”的零星回应,并非南宋人新创的“富贵”诗论。

可以说,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开展,在陈师道“看人富贵”评论出现之后,尽管宋代上层部分文人物质生活的富足尚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尽管南渡人物还在其闲谈和笔记作品中追怀昔日繁华的京师风物,但在诗歌理论中,晏殊时代那种盛谈富贵的风习却已成为过往的风景。南渡以后所出现的关于“富贵”诗论的零碎追记,同人物闲谈、笔记作品共同表现出南宋人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这也同南渡之后,诗词作品中再也没有北宋升平时期“富贵”歌咏的文学创作实况相一致。

注 释:

- ① 杨海明《唐宋词中的“富贵气”》,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第75-83页。
- ② 王德明《晏殊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第120-122页。
- ③ 王德明《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载《北方论丛》2003年第4期第76-79页。

参考文献:

- [1] 胡子纂,廖德明.茗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陶宗仪.说郛[M].北京:中国书店,1986.
- [4] 吴处厚,李裕民.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 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杜甫,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 [10] 许 总.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1] 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曾凡盛